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饶曙光等著

中国少数民族

Film History of Chinese Minorities

电影史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
土家族纳西族哈尼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傣族黎族土族达斡尔族蒙古族土家族苗族
乡族侗族仡佬族布依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
毛南族克族德昂族基诺族白族土家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
鄂温族珞巴族佤族拉祜族布朗族俄罗斯族赫哲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
巴族满族侗族拉祜族布朗族俄罗斯族赫哲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
族高山族羌族独龙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
族羌族独龙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
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族鄂伦春族赫哲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



中国电影出版社

古土乡毛鄂川巴高乌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家族哈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傣族克族黎族土族傈僳族达斡尔族佤族族畲族佬族高山族羌族拉祜族水家族纳族仂族德昂族保族蒙古族土家族纳西族傈僳族布依族族仫佬族基诺族水族撒族俄族赫哲族朝鲜族俄罗斯族苗族彝族壮族傈僳族达斡尔族独龙族苗族傣族黎族土族京族族路族侗族拉祜族布朗族俄罗斯族东族毛南族鄂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 / 饶曙光等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106-03316-3

I. ①中… II. ①饶… III. ①少数民族—电影史—中国 IV. ①J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7979号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

饶曙光等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v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 25.5 插页 / 1 字数 / 509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3316-3/J · 1255
定 价 60.00 元

导 言	001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009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少数民族电影创作（1949—1955）	023
第三章 “双百方针”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1956—1959）	067
第四章 曲折中发展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1960—1966）	103
第五章 新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1977—1990）	175
第六章 转折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1990—2000）	231
第七章 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创作（2000—2010）	259
第八章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女性形象分析	333
第九章 电视电影中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	351
第十章 少数民族电影发展战略和策略	367
附录：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目录	385
后 记	403

众所周知，斯大林曾经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提出过关于民族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斯大林还说过：“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方面的精神面貌不同。”按照斯大林的解释，资本主义以前是无所谓民族的。实际上这个定义等于否定了民族在生态上的存在。这与当代世界，尤其是中国纷繁复杂的民族现象更是相去甚远。比如，我国世代传承的民族语言至今仍有120多种，55个少数民族有15个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许多民族并不具备共同地域特征，经济生活处于相差悬殊的社会发展阶段。

炎黄子孙谓之百姓，蚩尤后裔称之黎民，合称为黎民百姓，是中华民族形成的最早主体，经过数千年的繁衍发展与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中华”一词，是公元300年魏晋时期忠信“天人合一”观念的哲人，从“中国”和“华夏”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复合而成的。最早出现华夏二字并称的，是《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春秋左传·正义》注：“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便成了中国、华夏的代名词。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祖先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从元谋人、蓝田人到北京人，展示了中华民族最早祖先的演化过程。大量的中华民族文化遗存还说明了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了北方、中原、南方三种不同的系统特征。在华夏、夷、三苗等族开发黄河流域、东部沿海一带和长江流域的同时或稍后，氏、羌、戎诸族开发西北和西部地区，濮、越等族开发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狄、匈奴等族开发北部草原地区，肃慎、东胡等族开发东北地区。随着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其与中原地区联系的加强，为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刘正寅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密切内在联系的整体，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并在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中不断巩固、发

展、壮大。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中华整体观念也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它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整体观念的起源可追溯至三代。中华民族还在其起源时代即表现出交流与统一的趋势。至西周，一统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体现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一统思想反映在民族问题上即是夏夷一统。”¹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的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方都在秦朝统一政权管辖下，并设有郡县加以统治。汉朝继承秦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更加强大。汉朝在西域（汉朝以后对今中国甘肃敦煌以西地区的总称）置都护府，增设17郡统辖四周各民族，形成了包括今天新疆各族人民先民在内的疆域宽广的国家。在汉朝与周边的少数民族进行频繁的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也遂被其他民族用来称呼华夏民族，形成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汉族。也就是说，经过秦朝的开创、汉朝的巩固与发展，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人数更加众多的稳定的民族共同体——汉族发展起来了。大一统的现实使大一统思想进一步完善，构成一个完整体系，并最终确立下来。而其表现于民族关系上的“华夷一统”思想也得到充分的发展，形成“华夷一体”的观念。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汉族人口最多，经济文化一直比较先进，所以在缔造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建立的中央王朝最多，起着主导作用。一些有作为的汉族皇帝，都很注意团结少数民族。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朱元璋说：“朕至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事实上，汉族所建立的中央王朝大都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承认和支持。回纥、突厥等民族首领在依附唐朝后，共同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承认唐朝的管辖；明代后期，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在与明王朝“封贡互市”后，将自己管辖的区域称为“大明金国”。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个朝代的中央政权既有汉族建立的，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匈奴、鲜卑、吐蕃、回鹘、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也在部分地区以至全国范围内建立过政权。他们的首领往往把自己所建立的政权和当时或历史上的中原王朝挂上钩。西晋末年，匈奴族人刘渊建立的“汉”政权，就以西汉皇室外甥自居，“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九世纪中期，西迁的回纥族人在今新疆北部和中亚一带，建立了哈拉汗王朝，也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大汗自称为“中国之君”。契丹族的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后，下诏书建立孔庙，崇奉孔子一如汉唐，并且实行和中原汉族政权一样的社会制度。而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更为祖国的大统一局面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汉族建立的政权是中国政权，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政权。各民族都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1 黄兴涛、刘正寅：《“中华民族”观念形成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载《北京日报》2002年11月11日。

中华各民族都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祖国。如康熙年间蒙古准噶尔部贵族噶尔丹横行蒙古草原，欲借俄罗斯火枪来对付清王朝，然终被康熙皇帝率领的清军和广大蒙古族同胞打败。辛亥革命前后，当一些少数民族上层在俄、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下，不顾民族和国家利益，利用国内的动荡局势，发动旨在分裂中国的“独立”运动时，我国各族人民以各种形式参加到反对侵略和维护统一的斗争中。蒙古族人民在反对外蒙古“独立”时，宣布“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表示“拥护各族一体的中华共和国，断无独立之理”。¹ 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短暂的割据局面和局部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¹ 在长期的大统一过程中，经济、文化交往把中国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创造和发展了中华文明。中国各民族相互依存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使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利益，产生了强大的亲和力、凝聚力。

“中华民族”一词的正式出现大约是1902年，最初人们使用它时，指代的主要是“汉族”。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等人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者。1902年，在《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这是“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使用，从上下文来说，梁所说的“中华民族”当指汉族，确切地说，指的是古华夏族和从华夏族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民族。1905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再次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则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此词的涵义，虽然他认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但他“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907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也多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他在梁启超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融合趋势和发展方向作了更加透彻的发挥和阐述：融合五族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是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即立宪后的“新中国”相对应的。应当说，杨度此处所使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已经初步具有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涵义。² 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则诞生于辛亥革命胜利和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吴贯因、袁世凯、梁启超、夏德渥、李大钊、常乃德及东、西蒙古王公这一时期都多次使用过“中华民族”一词，并对其涵义进行了阐释。与此同时，一些以推动民族平等融合为宗旨的社会组织如“中华民族大同会”和“五族国民合进会”也纷纷成立，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建立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另外，这一时期的《申报》、《民立报》、《民国日报》、《中国同盟会杂志》、《庸言》和《东方杂志》等报纸杂志，也都刊登了有关论述中华民族历

1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参见戴逸：《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和张传玺：《中国古代国家的历史特征》两文，载国家教委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2 参见黄兴涛、刘正寅：《“中华民族”观念形成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载《北京日报》2002年11月11日。

史和涵义的文章。如《中华民国解》中所称：“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有无亲疏之别。其后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也。”¹

民国初期，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是李大钊。1917年2月19日和4月18日，他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两文，针对日本人宣扬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提出了中国人应该激发出以各民族融合为基础的“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及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辞，今已早无是界，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云。”李大钊这里的“中华民族”指的是融合中华各个民族后的新民族。可以说，中华民族原来是专指汉族，后来意义扩大为指中华各个民族，是中华各个民族的统称。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华”逐渐发展为多民族涵义。因此，中华民族包括定居于中国领土内的所有中国民族，即包括当代的和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其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艺术和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蜚声于全世界，对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贡献是中华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历代政府虽都有一套关于民族事务的政策和制度，但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民族间无平等可言。新中国成立前的少数民族身受多种压迫，大部分处于族体萎缩、人口衰减的境地，一些小的民族更是如此。如鄂伦春族人口在1905—1917年间尚有4111人，1934年和1940年分别降为3700人和2697人，1945年时只剩下2000多人；赫哲族人口在清朝康熙初年（约1661年）约有12000多人，1930年下降为1980人，到1945年仅剩下300多人。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才赋予民族政策以真正平等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就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了许多民族政策主张，如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等等，这些政策主张和实践，为新中国建立民族政策体系奠定了基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我国民族政策发展历史的新篇章。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式确立。195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纲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组成、类型、区域界限、行政地位、名称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从此民族

¹ 载《民报》第15期，1907年7月。

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全面推行。1949年颁布的《共同纲领》就规定杂居的少数民族在当地政权中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1952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保护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份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对保障散居的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作出进一步明确规定。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即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团结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然而中国历史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人口比例、地理特征这些现实仍然存在，这一现实也正是“少数民族”这一概念得以成立的基础。迄今为止，通过民族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有56个，即现今的中华民族共包括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傈僳族、佤族、畲族、高山族、拉祜族、水族、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普米族、塔吉克族、怒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鄂温克族、德昂族、保安族、裕固族、京族、塔塔尔族、独龙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门巴族、珞巴族、基诺族。此外，尚有少量未经识别的人口。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1, 133, 682, 501人，其中汉族占91.96%，少数民族占8.0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时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民族大家庭内，各民族在一切权利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地联合和团结起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像前面提到的鄂伦春族和赫哲族，这两个民族的人口到1990年我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已分别达到7004人（鄂伦春族）和4254人（赫哲族）。实际上，由于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实行了有利于族体发展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率超过了汉族，在国内人口中的比例逐步提高。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为340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89%；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为398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77%；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达664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62%；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达90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01%。¹而据近年来的有关统计，现今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已超过了9%，总数已达一亿人以上。

中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中国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有宗教信仰，有的民族群众性地信仰某种宗教，如藏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制定了具体政策，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保障

1 参见吴仕民主编：《中国民族政策概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少数民族公民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中国少数民族中信仰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的有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门巴族、普米族、纳西族7个民族；信仰上座部佛教（俗称小乘佛教）的有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等民族和部分佤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10个民族；信仰基督教的有彝族、苗族、拉祜族、景颇族、傈僳族等族的一部分。俄罗斯族和鄂温克族的一小部分人信仰东正教。在独龙族、怒族、佤族、景颇族、高山族、鄂伦春族、珞巴族等一些少数民族中，还保持着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多种信仰。各民族群众，不论信仰何种宗教，他们正常的宗教活动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少数民族散居的地区，他们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也受到了充分地尊重和保护。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6%，但少数民族地区却占全国总面积的60%，其中大多数还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边境和拥有非常丰富自然资源的地区。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宗教信仰、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差异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冲突仍然不时出现，造成不同民族间的紧张对立和社会的不稳定。新中国采取的民族政策是力图使少数民族逐步融入中国社会的主流，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为了国家统一大局和最大范围、最大层面的团结人民，打击共同的敌人，通过电影来宣传民族政策，团结各少数民族就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辉煌也是建立在这种历史背景基础上的。

1996年12月，中央电视台与国家民委共同主办《中华民族》开始播出，每星期播出一期，每期30分钟。作为专门报道中国少数民族的专题类栏目，《中华民族》制作出许多优秀专题节目和纪录片，题材范围涉及了中国56个民族。栏目致力于展现中华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介绍中国西部的地域、人文环境，反映各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文化遗产，表现各民族同胞的精神面貌，促进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和交流，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传播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0年，费孝通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命题。所谓“多元”是指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由56个兄弟民族所组成的复合民族共同体；所谓“一体”是指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该整体是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生息、繁衍，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不同角色，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目前这一命题已为民族、考古、历史、文化等社会学界广泛接受，并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指导作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2005年正式用于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这个概念与“十二条”中的民族概念相得益彰，科学概括了中华民族的复杂现象和本质特征。历史渊源作为民族传统的内在依据，常常表现为血缘传统、祖籍观念、始祖传说以及其他共同的历史记忆或历史遗产，不仅反映在血

统而且反映在道统方面的观念上，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历史纽带，民族文化成就了民族内部的共同特征，在流传中变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精神追求或现实利益都可以成为民族认同的依据因素。正是族性特征的吐故纳新、生生不息及其与时俱进的生命力，成就了民族的历史稳定性。这种一体主要是文化认同上的一体，而非血缘关系的一体，否则便不能达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共为炎黄子孙之间的逻辑统一。“确认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也就是肯定中华民族的历史事实基础，尊重现代民族平等及其文明和谐精神。”¹

中央文件“十二条”郑重表述：“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自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我国的民族问题是我国的内部事务，反对一切外部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与许多国家的民族冲突动荡相比，我们经受住了苏联和东欧剧变、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的冲击和考验，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安宁而富有朝气的少数大国之一。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种来之不易的局面，同时认真总结相应的成功经验。最重要的，我们不仅要建立科学的民族观，更要建立科学的祖国观。

“当代多民族国家，都需要国民树立符合国家利益的民族观和祖国观。从现实国情出发，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社会主义祖国观的和谐统一。并且在各民族最高利益的原则基础上，将民族观和祖国观统一于爱国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是有数千年历史传承的统一，是各族人民创造的共同历史所规定的必然的统一。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国家的统一是各族人民共同生存的基础，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保障，是维护中华民族共同尊严的前提，因而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²

1 参见白建春：《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观建设》，载《学习之窗》2010年第1期。

2 参见白建春：《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观建设》，载《学习之窗》2010年第1期。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萌芽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7年，天一影片公司就拍摄了《花木兰从军》，影片由李萍倩执导，当时红极一时的女明星胡姗姗饰演花木兰一角。影片取材于中国古典诗词《木兰辞》，故事在原著的基础上加以杜撰，增添了诸多戏剧性的成分，如花父膝下无子，待字闺中的木兰原本已有亲事，临危受命替父奔赴前线，而自己的如意郎君韩士祺恰好也在军营之中，两人在战争的历练中情感愈加弥坚。无独有偶，翌年，侯曜在民新影片公司也编导了影片《木兰从军》，李丹丹饰演花木兰，情节上同天一公司的编撰稍有不同，与传统观念最大的变化是，花父看到木兰愿意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后心情大悦，完全没有忧戚之色。爱情是古装片题材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侯曜也为木兰设置了一位如意郎君，同样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这两部影片因为涉及塞外阻击胡虏的情节而成为可能是最早表现少数民族风情的电影，囿于影像资料的散佚，影片中是否存在真实的异域取景，如今我们已经无法取证了。1928年，管海峰在自己创办的海峰影片公司拍摄了一部长达十本的《昭君出塞》，故事描写汉室衰微，匈奴进犯，汉帝实行和亲政策，将妃子王昭君以公主身份嫁给呼韩邪单于，用联姻换来了汉朝北方边疆的和平与安定。相较之前两部影片，《昭君出塞》是一部全面表现少数民族的作品。20年代出现的这三部直接或间接体现出少数民族萌芽的影片，与其说是创作者具备民族团结的前瞻意识，不如说是受到了当时古装片盛行和改编历史剧风潮的影响。中国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始于新中国成立前，也是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要求所产生的。

1933年，在左翼电影创作处于高潮时，属于软性电影一派的“艺联”影片公司受美国蛮荒野兽猎奇片的影响，以所谓“开化瑶民”、“沟通文蛮的分野、发掘原始的遗迹”为主题，到广西苗族地区拍摄了《瑶山艳史》。影片根据当时发生的真实事件改编，汉族教师黄云焕先后在广西的横冲、大垌社、测田等学校任教，结识了紫荆山瑶族首领李荣保的女儿，并与之成婚。之后利用其特殊身份协助李荣保清剿瑶山匪患，并向广西政府汇报、扩大了李荣保的政治影响，为新桂系的“南宁晋见”营造了舆论氛围。他还为李荣保拟订了开发瑶族十八山的计划，报经政府批复后实施，并得到政府拨给枪支弹药和款项的资助。在屯垦十八

山、建立十八山区、乡政权，建立洪水界哨所，保护过往商旅等方面，黄云焕都成了李荣保的参谋和得力助手，为紫荆瑶族地区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在瑶民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威望。《瑶山艳史》由刘呐鸥出资成立的电影公司“艺联”于1933年在广西实地拍摄完成，刘呐鸥（黄漪磋）任编剧、杨小仲任导演，主演为游观仁、许曼丽。广州歌星罗慕兰、舞星孔绣云等也应邀受聘上了银幕。《瑶山艳史》发行放映后，至少使黄云焕这个“驸马爷”的声誉从瑶山传扬到了全国各地。

1933年，正值左翼电影创作处于高潮，反映阶级和贫富差距的影片大行其道，所以《瑶山艳史》这种反映阶级和民族矛盾调和的影片自然受到左翼电影工作者的猛烈批评。认为“很难找出《瑶山艳史》和什么《西游记》、《盘丝洞》之类的影片不同的价值来”¹，“以所谓‘开化瑶民’、‘沟通文蛮的分野、发掘原始的遗迹’为主题”²，绝对是对阶级和民族矛盾的想象中的调和，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更对少数民族作了歪曲的描写”³。对于此片，鲁迅在其杂文《电影的教训》也讥讽道：“这部片子，主题是‘开化瑶民’，机键是‘招驸马’，令人记起《四郎探母》以及《双阳公主追狄》这些戏本来。中国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伟论，近来不大听到了，要想去开化，自然只好退到苗瑶之类的里面去，而要成这种大事业，却首先须‘结亲’，黄帝子孙，也和黑人一样，不能和欧亚大国的公主结亲，所以精神文明就无法传播。这是大家可以由此明白的”。总之，号称是“沟通文蛮的分野、发掘原始的遗迹”，事实上不过是《瑶山艳史》受美国蛮荒野兽猎奇片的影响，想用猎奇的心理诱使观众进入电影院，是对少数民族的“歪曲与误解”。⁴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与《木兰辞》似乎有着不解之缘。1939年，张善琨组建的华成影片公司翻拍了电影《木兰从军》，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梅熹、韩兰根、尹秀岑、尤光照、章志直、汤杰等一线明星主演，这部影片打出了“当今绝无仅有忠烈伟大历史古装巨片”的旗号，双袖善舞的张善琨成功地将初出茅庐的陈云裳炒作为“南国第一红星”，塑造出了花木兰这一具有崇高爱国思想的民族女英雄形象，并以其时代的特殊性和题材的鲜明性使影片成为孤岛时期的一朵奇葩，创下了连映85天的纪录。陈云裳曾经说：“我从前演了一部《木兰从军》，后来演了《秦良玉》、《费贞娥刺虎》，我好像读了三册书，三册正义感的书，又如唱完了三首正气歌。”《木兰从军》在商业上的巨大收益也掀起了“孤岛”持续两年左右的古装片热潮。

与20年代的两部《木兰从军》相比，欧阳予倩为这部影片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用女性形象来表现爱国意识，一直是中国近代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无论

1 常人：《〈瑶山艳史〉评》，载《晨报》的《每日电影》，1933年9月2日。

2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页。

3 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页。

4 参见《电影艺术》1987第2期。

女性角色是作为被凌辱的受害者、有仁有义的妓女还是女侠，都象征了日本铁蹄下苦难深重的中国，这些女性角色成为战时中国文学艺术中的重要人物形象。¹《木兰从军》是欧阳予倩唯一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剧作，在他所有戏剧和电影作品里所描写的妇女形象中，花木兰也是唯一一个抗敌御侮、智勇双全并能主宰自己命运的英雄形象。² 欧阳予倩在创作的过程中，为了与时局相吻合，不自觉地也设计了抵御外邦的桥段，借此影射日帝国主义的侵略。《木兰从军》中有这样的一段情节，唐军到了沙漠地带后并不见番兵，以为番兵已闻风而退，不料却中了埋伏损失惨重，于是将军派刘元度和花木兰乔装去打探虚实，在私访中，他们遇到了几个番兵。当然，这几个番兵是汉人扮演的，异域也只不过是棚内简单置景而成。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说《木兰从军》是带有少数民族元素和风情的影片。



《木兰从军》剧照

在《木兰从军》票房丰收的刺激下，张善琨奉古装历史剧为主臬，华成影片公司又接连如法炮制了多部类似题材的影片，其中有一部作品也间接地带有了少数民族电影的色彩，这就是《秦良玉》。秦良玉的家族虽因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而汉化，却仍保持着苗族强悍崇武的特点。秦良玉是家中唯一的女孩，从小生得如花似玉，聪慧伶俐，深受父母宠爱。父亲依苗家传统从小训练她舞枪弄棒、骑马射箭。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刚满二十岁的秦良玉嫁给了石柱宣抚使马千乘为妻。石柱也属忠州，离秦良玉的娘家不远，是一个苗族人为主的郡县，朝廷设置宣抚使统辖这些归顺了大明的苗人。秦良玉嫁到马家，可谓是英雄找到了用武之地，她一身文韬武略派上了用场，几年时间，她就帮着丈夫训练了一支骁勇善战的“白杆兵”。影片《秦良玉》保留了《木兰从军》的原班人马，张善琨监制，卜万苍导演，陈云裳和梅熹这对银幕情侣分别饰演秦良玉和书生马千乘的角色。故事讲述的是明朝末年，书生马千乘因为家庭贫寒无以为计，见叔父马震南是西南苗境的石柱土司，便想趁着堂兄雄飞西归，一起去石柱投奔叔父。雄飞的朋友樊龙也准备去投奔，于是三人一同前往。到了苗境后，叔父只对樊龙很好，千乘见叔父势利，便愤懑着准备离开，在雄飞的劝阻下才多逗留了一日。当晚，苗族人在芦笙堂举行青年男女婚配盛会，男孩以情歌示爱，女孩用投花示爱，双方不得悔婚。千乘被秦良玉相中，无奈成婚后，秦良玉才发现千乘不是苗族人，感觉受

1 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2 李道新：《中国电影史1937-1945》，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骗的秦良玉打算砍死千乘，幸好被母亲及时制止，当秦良玉知道千乘是一知情达理的书生后才消气，最终二人厮守终生。

与《木兰辞》的编撰不同，作为明朝末年战功卓著的女性军事统帅、民族英雄、军事家，秦良玉曾率“白杆兵”参加平播、援辽、平奢、勤王、抗清、讨逆诸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单独载入《正史·将相列传》的巾帼英雄。同时她还是为数不多的文武双全女子，郭沫若曾撰文赞誉秦良玉：“像她这样不怕死不爱钱的一位女将，在历史上毕竟是很少的”。万历二十三年，秦良玉嫁石柱宣抚使马千乘为妻，她激励其夫在石柱建立了一支“戎伍肃然”为远近所惮的“白杆兵”，一对军营伉俪，铸就了中华民族战争史上的一代佳话。在《秦良玉》中共出现了两段着力表现苗寨风情的段落，其一是马千乘三人初入苗境，具本事记载，影片用了大量的篇幅集中表现了苗境山清水秀的旖旎风光；其二是苗族人在芦笙堂举行青年男女婚配的盛况，这是目前我们可以了解到得最早展示少数民族习俗的中国电影。然而，张善琨在处理这一题材时，大多是出于商人的投机心理作祟，只剽窃了秦良玉这样一位奇女子的名谓，在影片中小心翼翼地描摹着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尽管如此，汉苗两族相互团结共御外侮的主题显然是借古喻今的，具有积极的意义。

除了《木兰从军》和《秦良玉》之外，卜万苍还有一部作品与少数民族题材有着不解之缘，这便是为华新影片公司拍摄的《苏武牧羊》。事实上，张善琨为了摆脱金城大戏院首映合同限制，扩大首映范围，避免出品增多后造成积压，曾先后将部分影片挂上“华新影业公司”、“华成影业公司”的招牌，租卖给其他首轮影院。¹所以，这两个公司本为一家，《苏武牧羊》的监制仍为张善琨，孤岛时期最为知名的编剧周贻白执笔，男女主角依旧是陈云裳和梅熹这对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组合。影片描写汉武帝派苏武（梅熹饰）出使匈奴，匈奴王单于派卫律劝降，苏武宁死不屈，被逐北海放羊。匈奴少女张娇（陈云裳饰），绮年玉貌，被召入宫中习艺，单于之弟右谷蠡王垂涎之，张娇不从，也被放逐北海做苦役。不久，单于大举攻汉，汉武帝命李陵迎战，兵败援绝而归降，被封为右校王。李陵前往北海劝苏武投降，未成；于是请单于以女色引诱苏武。张娇钦慕苏武的节操，自愿以身许之，二人结合后，坚持在海外牧羊19年，备尝艰苦而志节不移。这时武帝已经去世，昭帝接位，遣使赴匈奴召还苏武，右谷蠡王同意苏武回国，惟不准张娇随行，结果张娇用铁簪自刎而死。时光荏苒，待苏武回到长安的那天，全城的人民都出来迎接他。他们瞧见白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手里拿着光杆子的旌节，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说他真是个大丈夫。

影片《苏武牧羊》主要是根据《汉书》中有关史料编写而成的故事。影片借“苏武留胡志不屈”的历史故事，歌颂了苏武“身羁匈奴心朝汉”的可贵民族气节。与此同时，剧作者还塑造了张娇这样一个由于仰慕苏武的凛然大节，愿以身

1 李道新：《中国电影史1937-1945》，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许之，帮助苏武度过艰难的岁月，期待着光明的到来，最后又以自刎显示了她的“芳魂节烈”的女性形象。当时的评论认为：“《苏武牧羊》是一页‘节’的歌颂！”

孤岛时期还有两部间接表现少数民族的影片，分别为艺华影业公司的《梁红玉》和合众影片公司的《香妃》，前者由周贻白编剧，岳枫导演，李绮年和梅熹主演；后者朱石麟编导，李英和王熙春主演。

为了与张善琨的新华影业公司抗衡，艺华影业公司也大肆改编古装剧，该公司在孤岛时期拍摄的五十余部影片中，有近1/3是武装题材。《梁红玉》是李绮年接拍的第一部古装片，在他的计划中，其后还有《西施》、《花木兰》、《王昭君》、《貂蝉》、《卓文君》和《燕子笺》等几部电影等待拍摄，从李绮年留下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这几部影片的立项和创作更多的是针对南洋市场，“这些都是历史剧，相信在南洋许多侨胞的脑海里，都已具有了一个概念，可是，因为那些配演的人都是当地的脚色。我这一次恐怕准备时间不够，限制我们合作的效果，所以我感到兴奋以外，对于这演技问题，更感到不少焦虑。”¹

相较之新华，严氏的艺华公司在古装片的创作上并无多少新意，更多的是投机于底层观众的趣味心理，因此大多数的古装片均是描写私订终身、才子佳人等传统封建礼教观念，和同时期艺华影业公司拍摄的《碧云宫》、《新盘丝洞》、《王宝钏》等影片相比，《梁红玉》算是其中创作较为严谨、思想尚属高尚的一部古装影片。事实上，作为宋朝著名抗金女英雄的梁红玉，只是其战死后各类野史和话本中所取的名字，相传她曾在平定苗傅叛乱中立下殊勋，一夜奔驰数百里召韩世忠入卫平叛，因此被封为安国夫人和护国夫人。与《秦良玉》相同之处在于，《梁红玉》也是表现夫妇联合抗敌的影片，在建炎四年长江阻击战中，梁红玉亲执桴鼓，和丈夫韩世忠共同指挥作战，将入侵的金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



《梁红玉》剧照

在孤岛时期，“新华”、“艺华”和“国华”是资金和实力最为雄厚的大公司，呈现三足鼎立的态势。合众影片公司只是一个艰难为继的小公司，1940年出品的《香妃》在同时期的古装片和朱石麟整个创作生涯的作品中，都不算是出众的一部，甚至只

¹ 李绮年：《我们能说的话》，引自《艺华画报梁红玉特刊》，1940年10月号，艺华影业公司。